

《后汉书》如何为循吏列传

□ 王佐成 张晓彤



灾民，要求皇帝以身作则、节俭开支。他说：“上之所取，财尽则怨，力尽则叛。怨叛之人，不可复使，故曰：百姓不足，君谁与足？惟陛下度之。”这句“百姓不能丰衣足食，君王又怎能心满意足呢？”的名言既是杨震饱读儒家民本思想典籍的深刻感悟，更是他一生为官始终不渝的行为准则。

汉安帝听信谗言，派人收取杨震太尉官印，下诏遣送回家。杨震悲愤不已，对自己的儿子和学生说：“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奸臣狡猾而不能诛，恶嬖女倾乱而不能禁，何面目复见日月！”便服毒而死。汉顺帝即位后，将陷害杨震的奸佞小人诛杀，为杨震平反昭雪，表彰他的忠心，任命他的两个儿子做郎官。

以遁世为非义，以仁心为己任

陈蕃，字仲举，官至太尉。从小树立平定天下的高远志向。面对权贵请托办事，他严正拒绝。面对宫廷开支巨大，他敢于进谏。当时封爵赏赐的现象越过了礼仪制度，内侍宠臣众多权势强盛，陈蕃便上疏劝谏。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放出宦女多达500余人。面对贪官污吏压迫导致百姓造反，他敢于提出正确处理办法。当时零陵、桂阳两地的百姓官逼民反，许多大臣主张派兵镇压，他上疏坚决反对，指出导致百姓造反的根源在于官吏贪虐。要消除动乱必须重建良好官民关系。他说：“宜严敕三府，隐核牧守令长，其有在政失和，侵暴百姓者，即便举奏，更选清贤奉公之人，能班宣法令情在爱惠者，可不劳王师，而群贼弭息矣。”面对刚刚遭遇国家大丧，皇位继承人还没有确定，各位尚书畏惧权贵势大的官员，都借口生病不去上朝。陈蕃写信斥责他们说：“古人立节，事亡如存。今帝祚未立，政事日盛，诸君奈何委荼蓼之苦，息偃在床？于义不足，焉得仁乎！”各位尚书感到惶

恐，全都行动起来办理事务。面对正直大臣公正执法被小人陷害时，陈蕃没有明哲保身，而是仗义相救。当时小黄门赵津、南阳大恶霸张汜等人依仗宦官权势违犯法令，太原和南阳两位太守审查他们的罪行，虽然已经有了豁免的命令，但还是将他们处死。宦官们泄愤报复，主管官员秉承旨义，将太守定罪斩首示众。陈蕃与司徒刘矩、司空刘茂共同进谏，为他们求情，皇帝感到不快，主管官员上奏弹劾，刘矩、刘茂不敢再多说。陈蕃便独自一人上疏谏说。陈蕃痛恨宦官专权乱政，他和大将军窦武谋划铲除宦官，由于事情泄露，失败被杀。范曄高度赞扬陈蕃临危不惧、敢于担当的高尚品格：“以遁世为非义，故屡退而不去；以仁心为己任，虽道远而弥厉。功虽不终，然其信义足以携持民心。汉世乱而不亡，百余年间，数公之力也。”

事不辞难，罪不逃刑

李膺，字元礼，担任司隶校尉官职。初举孝廉，再迁青州刺史。因为公正威严，他治下的庸官贪官纷纷辞职。那时鲜卑军队侵犯边境，李膺身先士卒，冒着矢箭冲锋陷阵，打得敌人望风而逃，威名远扬。永寿二年，鲜卑军队再次侵犯云中等边境，李膺到任后马上稳定局势。范曄称赞说：“自膺到边，皆望风惧服，先所掠男女，悉送还塞下。自是之后，声振远域。”汉灵帝时期，权势熏天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担任野王县的县令，贪残无道，事发后畏惧李膺威严，逃到张让家，藏在空心柱子里。李膺知道这一案件，率领手下进入张让家中，劈开柱子把张朔擒拿归案，在审问清楚罪行后将其处死。张让向汉灵帝申诉冤情，皇帝下诏令李膺上殿，责问他为什么不请示就把人杀了。他说：“诚自知衅责，死不旋踵，特乞留五日，克殄元恶，退就鼎镬，始生之愿也。”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皇帝无话可说，放李膺出官，责备张让说：你弟弟罪有应得，李膺没有错。从此宦官们再也不敢出去胡作非为。《后汉书》写道：自此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官省。帝怪问其故，叩头泣曰：“畏李校尉。”

后来张让的事件发生，朝廷收集逮捕与他相牵连的党徒，乡里人告诉李膺说：您可以离开了。他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于是前往诏令下传的监狱，被含冤拷打致死。总之，《后汉书》为杨震、陈蕃、李膺等一大批循吏列传，通过文中的“论”“赞”，表达了范曄推崇高洁刚正、不避危险的为官操守，也从侧面体现了他“正一代得失”的史学宗旨。



儒官范钦与他的私人藏书楼

□ 郑大壮

狱。狱中他未曾屈服，在洗清冤屈后被外放江西袁州任知府。袁州任上，内閣大学士严嵩之子严世蕃欲夺宣化公产，范钦不许并与其斗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发兵进犯大同直逼京师，史称“庚戌之变”。范钦闻讯，赋诗《闻虏惊》，希望能像“九边将士”那样出征前线，但因文官身份只能商讨制敌对策，难以施展抱负。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得知郭巨抗倭失利后悲愤交加，赋诗《江上闻郭巨失守，怅然有作》，痛斥当权者的无能。

惜书如金

古代读书人视学如命，惜书如金，范钦也不例外。在处理政事之余，他酷爱藏书，每到一处都留心当地善本，广罗书卷。据统计，他毕生藏书达7万余卷，也成为了“天一阁”藏书的主要来源，为后世研究明

代人文历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范钦藏书一大特点是不重视版本新旧，喜好收藏“今人之作”，包含大量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如嘉靖《翁源县志》《广东通志》《汀州府志》《象山县志》《昆山县志》，明洪武四年（1371年）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明建文二年（1400年）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等稀世文献。范钦还藏有大量官书，如《大阅录》《国子监监规》《军令》《营规》《船政》等，都是当时不宜外传的内刊，普通藏书家毕生难求。宋建阳刻本《十七史百将传》、明弘治八年（1495年）铜活字本《会通馆印辑补古今合璧事类》等孤本也是范钦藏书中的瑰宝。此外，范钦还亲自编写了《天一阁集》《范司马奏议》《贡举录》《歌谣谚语》《赋苑联芳》等多部著作。身为儒官，他还不断余力地抄书、刻书，并被后人辑为《范氏奇书》，其中收录《周易略例》《论语笔解》《孔子集语》《广成子解》《京氏

易传》等共计二十种。

致仕筑阁

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范钦遭南京御史王宗徐弹劾辞官，结束了30载宦海生涯。回乡后，他利用近5年时间在家宅之东修建了一座藏书阁，将毕生所藏精华汇集于此，取名“天一阁”。藏书阁主色调为黑色，寓意以水克火，足见他对防火的重视。“天一”意为生水，取自汉代经学家郑玄所注《易经》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天一阁”为上下一两层坐北朝南木结构建筑，楼上为一个大通间，暗合“天一”，用于藏书；楼下是六开间，暗合“地六”，用于日常生活。范钦还在藏书阁前开凿蓄水池以备救火，修建防火巷将生活区与藏书区分隔。历经400余年，“天一阁”未遭受一次火灾，令人惊叹不已。为妥善管理和保存书籍，范钦立下了“代

俄国作家果戈理与平民知识分子崛起的时代

□ 张雷刚

西，甚至受到了攻击和谩骂。于是，果戈理明白了，“作为一个戏剧作家意味着什么。只要有一点真理的迹象，就会有人起来反对你，而且不是一个人，而是好些阶层”。此时，在文学创作上他是醒眼的，但是他却感到痛苦。

（二）

1836年，带着这样一种苦闷的心情，果戈理选择去国外漂泊，他说：“我现在所需要的是道路，是的，道路，冒着雨，踩着泥泞，穿过森林，跨过草原，去往天涯海角。”5年后，果戈理带着另外一部伟大的著作《死魂灵》返回故土。《死魂灵》第一卷的出版再次震撼了俄国，它对俄国社会的批判是如此的深刻，人们争相阅读，表现出了两种鲜明的态度和完全相反的观点：不是欢欣鼓舞的喜悦，就是冷酷无情的憎恨。站在中间的果戈理怅然若失地再次踏上漂泊之路，他对朋友说道：“我走，向何处去——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1845年，果戈理自觉将不久于人世，提前立下遗嘱。在遗嘱中，他请求朋友们帮他整理彼此之间的信件，选择“有益于人心者”编成单册出版。他还对近年来的思想进行了总结，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来审视自我，审视那些曾经给他带来荣誉的作品，并将它们称之为“苍白无力之作”。结果遗嘱并没有派上用场，他康复了。于是自己动手整理信件，于1847年出版了《与友人简书》，并将遗嘱作为前言刊出。在《与友人简书》中，果戈理像换了一个人，浑身上下失去了往日揭露和讽刺皇权专制与农奴制度的批判现实主义色彩，散发出了浓浓的保守主义味道。

果戈理思想的这种转变让所有人始料不及，他的作品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别林斯基大喊“果戈理疯了，精神失常了”，一时间俄国出现了“果戈理蜕变”“果戈理堕落”之说。别林斯基对这位曾被称作“最伟大的俄国诗人”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他说这是一本“卑鄙的书，无耻之徒的卑鄙”。他在巴黎发表了著名的《给果戈理的一封信》，向果戈理发出了质问，“你在干什么？你站在深渊边上，你根据正教而发你的高论……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俄国思想界都被卷入了这场争论，果戈理的“赞美者”和“谩骂者”戏剧般地颠倒了位置。最终，别林斯基取得了胜利，1848年果戈理发表了《作者的忏悔书》。果戈理累了，他不想再争论下去。

（三）

果戈理和别林斯基的论战是俄国知识分子当中两个阶层思想交锋的最早表露，因而也被称之为“一个俄国（贵族）与另一个俄国（平民）的决斗”。果戈理所展现出的这种“双面性”，实

际上是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共同特性。他们一方面痛恨农奴制的罪恶，同情农奴，另一方面又在经济生活上离不开农奴，这种思想上的进步和行动上的无力成为了他们致命的弱点。同为贵族知识分子的果戈理的学生屠格涅夫时常“忏悔”：“厌恶我自己，厌恶所有那些空闲、富足的人”。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果戈理会主动示弱，在农奴制问题上的道德劣势使他无法与处于上升态势的平民知识分子阶层对抗，尤其是那些同情他的贵族知识分子也选择了沉默，甚至唯恐避之不及。

1852年，在别林斯基去世4年后果戈理病逝，临死前他焚毁了所有的书稿，包括《死魂灵》的第二卷。此刻，果戈理是孤独的，似乎到头来没有人真正地懂他。他仿佛听到了已经逝去的普希金的声音：“把我的满腔欢乐化为灰烬……请你永远留驻在我的悲凉的心底。”果戈理的真实心声从来就没有变过，就如他自己所说：“从很年轻时候起，我就只有一条路，我现在还在走这条路……我对自己的力量已达到成熟、充满自信、大胆地说出了以前缄口不语的话，这就是我神秘主义的全部历史。”这种长久的不被理解，或许才是果戈理痛苦的根源，这种心灵上的孤寂几乎伴随了他的一生，他默默地向友人倾诉，“我无家可归，风浪向我打来，把我颠摇，支撑着我的铁锚只是那种使我心中产生崇高力量的自豪”。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谈道：文学史上很少有那个时刻能够与果戈理临死前焚烧手稿的事件相比，这是勇气、真诚和精神纯洁的象征。果戈理始终忠于自己的信念，他清醒地知道，那些把他当“疯子”的人并不是出于恶意，这是一个悲剧的社会所酿造出来的悲剧性的分歧。他的墓碑上只有一句话，“我因我悲苦的话而发笑”，只是不知道他所苦笑的是自己，还是他无力改变的俄国社会，抑或是对他爱恨交加的俄国思想界。“如果不死，也就不会复活”，这是果戈理晚年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果戈理将文学艺术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他失去了生命，却也因此解放了灵魂，就像他在弥留之际所写到的那样：“当火焰烧毁我的书的最后几页时，它的内容突然像从烈火中飞出来的凤凰一样，清晰而明朗地复活了。”

无论如何，果戈理在文学道路上开辟出了一个新的方向。他忠于真实的生活，毫不留情地揭露一切假、恶、丑的东西，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他在我们心中唤醒了对我们自己的认识”，他的创作对于俄国和其他国家现实主义艺术的成长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他所塑造的形象也必将保持其不朽的意义。



河姆渡文明孕育的浙东宁波，文脉赓续，教泽绵长。在这个文教之邦里有一座被誉为“南国书城”的私人藏书楼“天一阁”，创建人是明嘉靖年间的儒官范钦。范钦及其后人以强大意志贯彻家族铁律，将“天一阁”传承了十三代。清代名臣阮元在《定香亭笔谈》中慨叹：“范氏天一阁自明至今数百年，海内藏书之家惟此岿然独存。”不得不說，屹立不倒的“天一阁”是中华大地上的一个文化奇迹。

坚守忠道

范钦（1506—1585年），字尧卿，号东明，浙江鄞县（今宁波市）人，明嘉靖十一年（1532年）进士。据《鄞范氏族谱》记载，范钦初任湖广随州知州，历升工部员外郎、袁州知府、江西按察副使、福建按察使、广西廉使、云南右布政使、陕西左布政使、河南左布政使、南畿巡抚、右副督御史、北京兵部右侍郎等职，宦迹遍布半个中国。范钦为人忠直，做官清正，多次以政绩升迁，也屡因得罪权贵被贬。明中晚期朝政腐败，但他始终明理爱国，秉公办事，勤政为民。任工部员外郎期间，他负责管理内外庙官，发现权臣武定侯郭勋私吞官钱，遂上奏检举，却反遭诬告被下

狱。狱中他未曾屈服，在洗清冤屈后被外放江西袁州任知府。袁州任上，内閣大学士严嵩之子严世蕃欲夺宣化公产，范钦不许并与其斗争。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蒙古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发兵进犯大同直逼京师，史称“庚戌之变”。范钦闻讯，赋诗《闻虏惊》，希望能像“九边将士”那样出征前线，但因文官身份只能商讨制敌对策，难以施展抱负。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年），他得知郭巨抗倭失利后悲愤交加，赋诗《江上闻郭巨失守，怅然有作》，痛斥当权者的无能。

代人文历史留下了珍贵资料。范钦藏书一大特点是不重视版本新旧，喜好收藏“今人之作”，包含大量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如嘉靖《翁源县志》《广东通志》《汀州府志》《象山县志》《昆山县志》，明洪武四年（1371年）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明建文二年（1400年）会试录和进士登科录等稀世文献。范钦还藏有大量官书，如《大阅录》《国子监监规》《军令》《营规》《船政》等，都是当时不宜外传的内刊，普通藏书家毕生难求。宋建阳刻本《十七史百将传》、明弘治八年（1495年）铜活字本《会通馆印辑补古今合璧事类》等孤本也是范钦藏书中的瑰宝。此外，范钦还亲自编写了《天一阁集》《范司马奏议》《贡举录》《歌谣谚语》《赋苑联芳》等多部著作。身为儒官，他还不断余力地抄书、刻书，并被后人辑为《范氏奇书》，其中收录《周易略例》《论语笔解》《孔子集语》《广成子解》《京氏

易传》等共计二十种。

不分书，书不出阁”“外姓人不得入阁”“不得私领亲友入阁”“不得无故入阁”等制度，一是避免后世将藏书视为遗产进行再分配，二是防止书籍遭到破坏或散落、丢失。范钦还规定阁门和书橱钥匙必须要由子孙多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不能开锁，违规者将受到惩罚，有效防止了个人侵占，建立了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了“天一阁”特有的藏书文化。

流芳百世

范钦为官时的政绩可谓中规中矩，并非大有作为，不比同时代的张居正、戚继光等名臣，但他排除万难藏书，筑阁以传经典，不可不说成就了一番事业，彪炳千秋。清康熙二十二年（1673年），名儒黄宗羲被破例允许登阁，他在后来写的《天一阁藏书记》中感慨：“常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也

